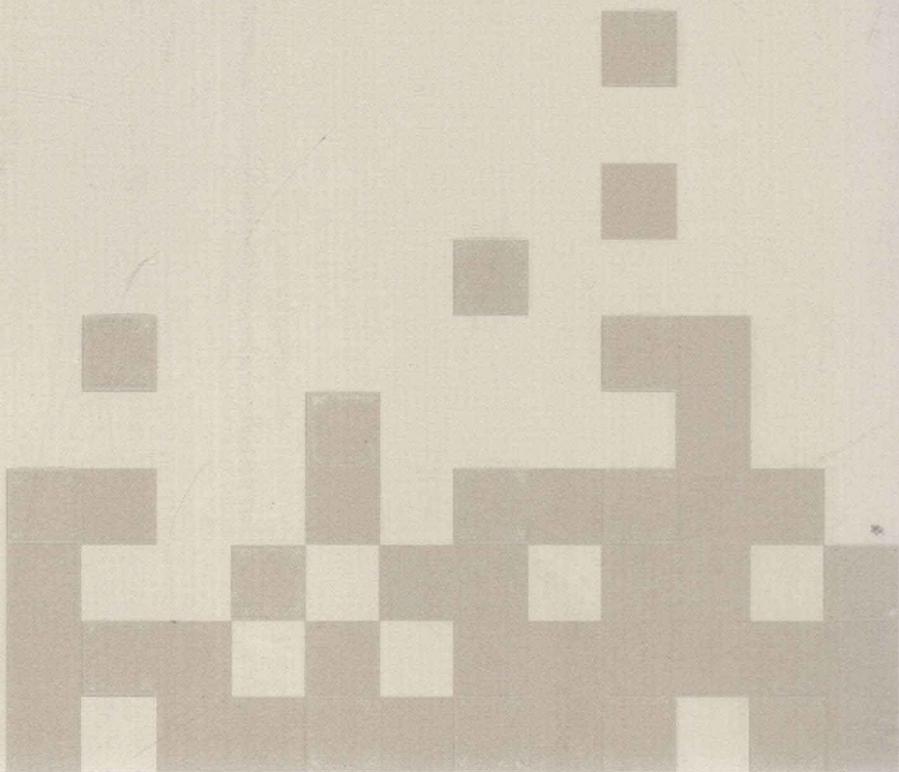




青年学者文丛



传播技术与 传播理论的范式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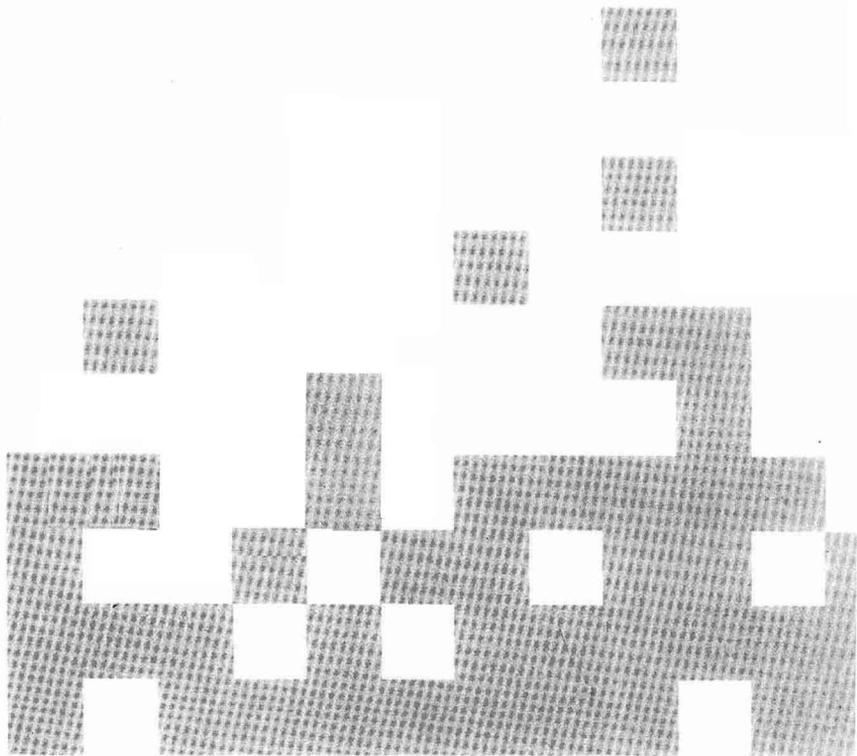
◎ 韦 路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青年学者文丛



传播技术研究与 传播理论的范式转移

◎ 韦 路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播技术研究与传播理论的范式转移 / 韦路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9
(浙大人文青年学者文丛)
ISBN 978-7-308-07671-5

I. ①传… II. ①韦… III. ①传播学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7087 号

传播技术研究与传播理论的范式转移

韦 路 著

责任编辑 李海燕
封面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45 千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7671-5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浙大人文青年学者文丛

总序

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部策划的《浙大人文青年学者文丛》与读者见面了，这实在是一件值得特别庆贺的事。

值此庆贺之机，不揣粗陋，说一点与当下人文学科的境遇与发展相关的感想，与本《文丛》的作者和读者朋友们交流求教。

关于人文及人文学科内容的表述，中国和西方虽有不同，但其意蕴与精神，两者的看法则大体相同。

一般认为，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是《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辞》）意思是说，天生有男有女，男刚女柔，刚柔交错，这是天文，也即四时更替、天道自然；人类因此而有了夫妇，有了家庭，由家庭而国家，而天下，这是人文，也即社会人伦、人类文明。治国者既要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又须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因此，他强调“仁学”，要求人们“修德”、“讲学”、“徙义”、“改过”，学会“做人”、“爱人”，这是孔子对什么是人文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人文教化”的日常要求和经验总结。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早期古代希腊时期，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科学是真正综合



的。亚里士多德开始寻找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区分了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科学,但他并没有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明确区分开来,而是仍然将自然哲学、数学和形而上学一起作为理论科学,将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一起作为实践科学,将诗和修辞学归入以生产某物为目的的创制科学。后来所说的人文科学的某些观念,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作为通识教育内容,目的是培养年轻人成为积极的公民。据说“人文学”(humanitas)概念最早由古罗马的西塞罗在《论演讲》中提出来的,作为培养雄辩家的教育内容,成为古典教育的基本纲领,并由圣奥古斯丁用在基督教教育课程中,围绕基督教教义学习语法、修辞、诗歌、历史、道德哲学。此后,人文学科便作为中世纪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中世纪后期,一些学者开始脱离神学传统,研究和发掘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认为这种古典文化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是一种与非神学的世俗文化,并用 humanitas(人文学)来称呼这种新学问。大约到16世纪,“人文学”一词有了更广泛的含义,指的是这样一种文化现象:针对上帝至上的宗教观念,主张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重视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从事人文学研究的学者于是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直到19世纪时,西方学者才用“人文主义”一词来概括这一文化现象,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成了英美学院和欧洲大陆大学预科基础教育的基本内容。随着近代实验科学的不断发展,人文学科逐渐明确了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成为独立的知识领域。按美国国会关于为人文学科设立国家资助基金的法案中的规定,“人文学科包括如下研究范畴:现代与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法学、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艺术



实践以及具有人文主义内容和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其它社会科学。”^①欧盟一些主要研究资助机构对人文科学的范畴划分略有不同。欧洲科学基金会认为人文科学包括：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和艺术史、历史、科学哲学史、语言学、文学、东方与非洲研究、教育、传媒研究、音乐、哲学、心理学、宗教与神学；欧洲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则将艺术、历史、文学、语言学、哲学、宗教、人类学、当代史、传媒研究、心理学等归入人文科学范畴。这些差异反映了一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相互交叉的趋势，所谓的学科分类也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更不是唯一的。

可见，从传统上看，人文学科是欧美大学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属于教育学的基本科目类别；人文科学则是人文学科这一独立知识领域的总称，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与社会及其活动，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价值和精神。探求人的奥秘，便形成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存在与发展，与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相生相伴，须臾不能分离。

随着近代西方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学科分化和社会变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从本来的整体综合逐渐出现分化与疏离，表现出明显的区别。自然科学以自然界的物质现象为研究对象，是关于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通过观察、实验的方法，揭示各种物质形态的结构和本质，认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并直接服务于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动，其特点是可重复性、可复制性。人文科学则研究人与社会及其活动，主要探讨人类历史发展、人的意识、情感、精神活动，通常采用引证与诠释、直观与体验、演绎与推论、想象与联想，以及思想实验等以语言分析、逻辑抽象和精神官能为基础的方法，使用难以用实验科学方法加以验证的范畴概念，如现象、本质、价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人文学科”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



值、命运、自由意志等，揭示人自身的生存状态、活动形式及其价值与意义，突出认识和体验的独特性、偶然性和创造性，或者获得“具体的”个别和独特的认识内容与价值观念，或者形成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普遍经验和一般原则，其特点是不可重复性、不可复制性。

自古以来，人文科学就在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自身及其社会的发展。以哲学为例，中国古代哲学，无论是孔孟之道还是黄老之学，对人自身的德行养成和素质发展，对社会的政治影响和秩序稳定，都起着科学技术所不能替代的深刻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西方哲学，无论是传统理论还是现代思想，都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理解和把握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步伐，从不同角度打开了深入探索、理解自然世界和人类自身及其社会奥秘的通道，决定性地影响了欧洲自然科学世界观的道路和方法，奠定了自然科学实验观察和科学分析的理论基础。即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规则主导的当今世界，人们也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运用着人文科学提供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以及思维与生活方式，享受着人文科学所带来的实际成果。今天谁都不会否认，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哲学讨论，就没有涉及理论、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人的生活态度各个方面的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也就不会有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三十多年来，人文科学和其它社会科学一起，一次次将关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到时代和大众面前，持续地引领着人们的社会想象和公共论题，塑造了整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公众话语模式和心理结构。

可是我们看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文学科在当今社会却受到明显的不同程度的误解、冷遇甚至排斥，人们越来越喜欢用直接可见的“有用”与“无用”作为衡量大学学科与专业之生存标准。对这种状况，我们无需怨天尤人。作为基础研究领域，人文学科具有自身的内在特征，诸如：它在根本



目标上与直接的经济发展要求存在着正常的疏离,其研究一般需经历较长的过程,研究的结果也难以精确预见和预测,因而被挤到急切发展经济的当下社会的边缘,不在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们的视野焦点之中,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它所面对的是人自身,人作为有思想的主体,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认识和改变着自身,这一过程是无止境的,因而,最初的人文学者及其理论所讨论的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全部消失,许多问题仍然会被后人们反复讨论,却不能获得确定无疑的结论;它研究的虽然都是人自身,但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根据不同的观念和角度,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出不同的认识,不同时代对同一问题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认识,甚至同一个人对自己研究的同一问题前后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而这许多认识和观点,并不一定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不能用实验的方法予以验证,一般也难以获得普遍的认可和最终的答案;这本来正是人文科学具有永恒魅力的原因之一,可是却与人们通常那种追求解决实在问题、获取具体认知与效益的愿望,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会让人生出厌倦无聊的情绪。科学技术的价值表现是直接的,作用发挥是显性而当下可见的,人文科学与之不同,它的价值表现是间接的,作用发挥是隐性而缓慢延后的,人们往往容易看到科学技术直接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人们生活的改善,却忘记或忽视了推动这种变化的思想观念的深层次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关系的改革和调整的力量。从人文学科具有的诸如此类特征,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理解人文学科当下遭际的一些理由。

理解这种遭际的现实,并不就是默认它的合理性,更不是让我们消极地抱怨与等待,而是要面对现实,通过自身的努力去逐渐改变这种现实。我以为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从事人文学科教学和研究者自身,包括青年学者在内,要以一种人文精神去对待所从事的职业与事业,把握人文学科的



特征,相信人文学科对社会和人生的意义,恰当看待学科的冷与热,尽可能摆脱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坚守人类自身不可离异的精神家园,以积极的态度延续与发展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青年学者文丛》的编辑出版,便是这种坚守和发展的一种承诺与措施,将为人文学科青年学者们提供发表研究成果、交流研究心得的可以信赖的阵地。本《文丛》将精心选编本校人文学科青年学者的研究著作,也包括其它学科青年学者属于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人文学部将对有志于该学科研究的青年学者们给予研究和出版的经费支持。十多年前,曾担任过香港首届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先生以宏远的眼光,在原杭州大学设立大陆高校第一个文史哲研究基金,扶持和培养了大批人文学科青年才俊,其中许多人已成为相应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我们有理由对本《文丛》满怀同样的期待,愿与人文学科的青年朋友们共同耕耘这个阵地,一起分享收获的喜悦,与《文丛》相伴着成长。

庞学铨

2010年8月于西子湖畔浙大



前言

“我们创造了工具，之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We shape our tools and afterwards our tools shape us.)^①

——马歇尔·麦克卢汉

在麦克卢汉的名言中，上面这句并不起眼，并且很容易被“媒介即讯息”、“地球村”、“冷媒介，热媒介”这些光芒四射的语句所掩盖。也正因为如此，麦克卢汉常常被人们扣上技术决定论者的标签。我无意为此而辩解，但感到有必要澄清一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并非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绝对和极端。

1999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一次关于“重新认识麦克卢汉”的会议中，艾伦·巴尔卡(Ellen Balka)提出要对麦氏的“媒介即讯息”这一理论进行重新审视。他认为麦克卢汉不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而是一个社会结构论者。^② 从一个社会结构论者的角度来理解“媒介即讯息”，那么它就有两方面的含义：技术在对社会起作用的同时也被社会所设计和塑造，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是紧密相连的。

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股重要力量，理论研究，特别是传播理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然而，前人著述大多从传播技术或传播理论这两条主线阐释各

^① McLuhan, Marshall.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First McGraw-Hill Paperback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p. 7.

^② Balka, Ellen. (2000). Rethinking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Agency and Technology in McLuhan's Writings.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incorporating Culture and Policy*, No. 94, pp. 73-85.



自的发展演变和社会角色,对二者之间的联系关注不够。即使偶有勾连,也多强调单向影响,未能呈现传播技术演变与传播理论发展之间的复杂互动。本书首次将二者结合,从传播技术研究的角度探索传播理论的诞生和发展,试图揭示二者之间的历史联系,从而加深我们对传播技术和传播理论本身的理解。

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人类对传播技术的社会研究为线索,回顾了传播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现代传播技术的初步思考与大众社会理论。19世纪末,以印刷和电影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问世,使传统的宗族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从农田走向工厂,从乡村移居城市,旧有的文化规范和稳定的社会秩序被打破。伴随大众社会而兴起的大众媒介不仅为人们呈现出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也给他们带来了似乎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在当时的社会学者眼中,大众传播技术是一切混乱、冲突、邪恶和犯罪的根源。这种难以掩饰的恐惧促使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将理论阐释的重点置于媒介技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这也构成了当时主导性传播理论——大众社会理论(mass society theory)——的核心内容。可以说,一方面,大众传播技术的出现及其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导致传播研究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并形成了现代传播理论的早期阶段;另一方面,大众社会理论的风行也迫使政府决策者们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对大众传播技术的可怕威力进行限制,以维持统治的连续性和社会的稳定性。

第二,传播技术的科学考察与有限效果范式。大众社会理论基本上是理论家们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历对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所进行的推论,所以它是一种主观的、有价值偏向的研究范式,即非科学的理论范式。于是,一些接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社会学者开始认识到对于媒介的社会影响仅仅进行推测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周密设计的实地调查或实验来观察和测量媒介的影响及其程度,然后再得出结论。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为代表的传播学者开始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对传播技术的实际效果进行考察,并且发现媒介并不像人



们想象中的那么有力。人们不仅有许多抵制媒介影响的方法,还会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不断积累,促使一种新的传播理论范式——有限效果范式于60年代中期得以确立。传播技术与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一阶段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大众传播技术,特别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技术的扩散,使学者们不得不以一种更加冷静和科学的态度来审视传播技术的复杂影响,因而导致传播科学(communiation science)的形成。另一方面,当大量传播实证研究发现传播技术的社会影响并不像大众社会理论所断言的那样可怕时,媒介公司和其他商业组织开始资助更多的实证研究,以帮助媒介公司抵制外界批评、维持自由运作,并直接将这些“管理研究”(administration research)的发现用于提高传播技术的营销与说服效果。

第三,传播技术的意义探索和价值评判与传播文化理论。有限效果范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现代传播学理论进入成熟阶段,也使传播学成为现代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但是这一科学范式并未让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的学者感到信服。在大众社会理论有着深刻根源的欧洲,学者们就认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带有明显的美国烙印,只问“是什么”,而不问“为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从而忽略了人类传播活动的另外两个重要问题:意义和价值。于是,传播学者开始从这两个问题出发,对现代传播技术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探寻,并发展出传播的微观文化理论(microscopic cultural theories)和宏观文化理论(macroscopic cultural theories)。前者注重寻求传播技术和媒介在个体层面和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意义并对其加以解释,大致属于诠释研究范式;后者往往从宏观的角度对媒介技术如何影响社会整体秩序进行价值批判,大致属于批判研究范式。同样,这一阶段的理论发展也离不开与传播技术的互动。一方面,传播技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进一步渗透,使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媒介化社会(mediated society),导致传播技术的文化影响成为传播学者无法回避的话题;另一方面,传播文化研究也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要使用这些传播技术,以及应该如何使用,以更好地利用传播技术来为人类寻求福祉。



经过以上三个阶段与传播技术的互动,现代传播理论渐趋多元与成熟。可以说,传播理论的诞生和发展离不开传播技术的推进,传播技术是传播学理论诞生的直接诱因,而人类对于传播技术的影响和控制、意义和价值的理论研究又反过来塑造了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演变,使技术的变迁一直根植于连续而非断裂的社会进程之中。

基于此,本书的结构也围绕这三个阶段展开。第一章作为引论,对传播技术与传播理论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界定和概述。第二章描述了二者互动的第一阶段,即现代传播技术的初步思考与大众社会理论,并对大众社会理论的典型代表——宣传理论——与传播技术之间的关系和结果进行了分析。第三章主要呈现了第二个互动阶段的情况,即现代传播技术的科学考察与有限效果范式,阐释了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技术与形成该范式的一些经典传播研究之间的关系。第四章探讨现代传播技术的意义探索与微观文化理论,试图解释传播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问题;第五章则分析传播技术的价值评判与宏观文化理论,对传播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各种角色进行评价。这两章共同论述了第三个阶段中传播技术与理论的互动。第六章对全书进行了总结,从更加广阔的层面对传播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演进过程和模式进行了描述,并对传播理论朝着文化的方向走向融合的趋势进行了概括。

不论是传播技术,还是传播理论,要准确地理解,都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在技术和理论的相互影响中呈现其动态性、复杂性和丰富性。本书的目的正是要与读者一道,从这一新的视角出发,来解读传播技术研究与传播理论的范式转移。

韦 路

2010年5月8日于玉泉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传播技术与传播理论的关系	1
第一节 传播技术的界定与发展	1
第二节 传播理论的界定与发展	9
第三节 现代传播技术与传播理论的关系	16
第二章 现代传播技术的初步思考与大众社会理论	28
第一节 印刷技术的席卷威力与大众社会理论	28
第二节 电影效果的初步探索与宣传理论	43
第三节 技术控制与规范理论	63
第三章 现代传播技术的科学考察与有限效果范式	83
第一节 传播研究的科学方法与传播理论的范式转移	83
第二节 电影效果的科学研究与说服理论	88
第三节 广播效果的科学研究与有限效果理论	94
第四节 电视效果的科学研究与暴力理论	105
第五节 互动传播技术与受众中心理论	113



第四章 现代传播技术的意义探索与微观文化理论	124
第一节 传播技术的日常意义与仪式理论	126
第二节 传播技术的中介作用与符号互动理论	134
第三节 传播技术的意义建构与框架理论	144
第四节 传播技术的文化意义与涵化理论	155
第五章 现代传播技术的价值评判与宏观文化理论	165
第一节 传播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	165
第二节 传播技术的制度分析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179
第三节 传播技术的文化霸权与英国文化研究	191
第四节 媒介技术的本体研究与多伦多学派	202
第六章 结论:传播技术与传播理论的未来	220
第一节 传播技术的演进模式	221
第二节 传播理论的融合趋向	235
参考文献	245
后 记	263



第一章

引论：传播技术与传播理论的关系

没有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像传播学那样与技术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人类借以进行沟通的传播技术由来已久,其历史与人类的发展史同步。从语言到文字,从手抄到印刷,从电子到网络,媒介技术不仅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成为区分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鲜明标志。与历史悠久的传播技术相比,传播学却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它孕育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确立于20世纪40年代。虽然传播技术与传播学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但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却十分清晰:人类信息传播技术在上述历史时期进入现代阶段,导致现代大众传媒业的兴起与发展,进而导致传播学这门重要的现代社会科学的问世。传播技术是传播学理论诞生的直接诱因,而人类对于传播技术的影响和控制、意义和价值的不懈探索则是传播学理论蓬勃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第一节 传播技术的界定与发展

技术(technology)在英文中源于拉丁文“texere”,意思是编织或建造。我们通常对技术的理解是工具或机器,这是不全面的。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罗杰斯(Rogers)对技术作了这样的定义:技术是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对手段和途径进行



的某种设计,以减少因果关系中的不确定性。^①他认为技术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硬件方面(物质或物理实体)和软件方面(硬件运行的信息基础)。例如,我们可以将电脑技术分成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包括各种元器件、主板和导线等,软件则包括帮助我们使用这些工具的各种程序和指令。由于人们通常看到的只是电脑的硬件部分,因而往往将电脑技术视为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设备。事实上,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是电脑技术不可缺少的。另外,作为人类生产和活动的手段和方式,技术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人们使用技术总是为了解决某一问题或实现某种意图。因此,本书对于技术的定义为,人们在某一特定领域为了实现某种意图而对知识的实际运用。技术是人们创造性思维的物化,同时也是人们与自然互动的工具。

传播技术(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是技术的一种,“是人们用以收集、处理并和他人交换信息的硬件设备、组织结构和价值观念”。^②这里,技术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信息传播活动。自古以来,人类对于信息交流和情感沟通的需要就一直存在,各种传播技术就是人类为了满足这些日益增长的传播需要而创造出来的。

在人类诞生后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只能使用原始古老的交际方式,如姿态、手势和一些简单的声音。由于原始人类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人们只有采取群居的生活方式才能有效地抵御猛兽的袭击并猎取食物。劳动使得人们相互之间需要交流的东西越来越多,“已经到了彼此之间非说不可的地步了”,^③于是发明了语言。语言使原始人类的口头传播从简单的声音刺激发展成为复杂的反映人脑思维的音义传播系统,从而彻底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转变。语言传播具有许多突出的优点。首先,语言传播相对于“姿势语”来说传播内容更加丰富,不仅可以表达一些

① Rogers, E. M. (1983).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3rd Edi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② Rogers, E. M. (1995).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p. 12.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8页。